

缅怀吴征镒先生

——忆他与我所孢粉学实验室的创建

韦仲新

(194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吴征镒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然而他的音容宛在。他是一名从事70多年植物学研究、中外闻名的植物学家；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权威学者；他培养了一大批植物学工作者和学科带头人。正因为他在植物学科上取得的和突出贡献，先后获多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奖励，其中2007年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尤为突出。他为当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植物学面向世界作出了无可非议的贡献。这一切不仅令人们十分敬佩，而且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我第一次见到吴征镒先生是50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来昆明植物研究所的1964年。后来不久我被调到西双版纳植物园去了，与他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对他的了解不多。直到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再次分配回昆明植物所并一直在这里工作，这样与吴先生相处的机会就多了，对他的了解也渐渐增多。下面让我就他对我所孢粉学实验室的建立和孢粉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给予的关怀和支持；对孢粉学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选择以及研究过程中的悉心指导等方面作个简单的回顾。可以说，30多年来我们所在孢粉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无不渗透有他的汗水。

我1981年回所后，摆在面前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从事孢粉形态学的研究；二是搞木材解剖学工作。当所里从这两个研究方向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搞孢粉学研究。原因是我读研究生期间，曾接触过孢粉学，虽然学得很肤浅。加之，据说早在60年代，高瞻远瞩的吴先生就提出要在我所建立孢粉学实验室，进行孢粉学研究。由此可见，他对于在我所开展孢粉形态的研究早就心中有数。虽然我对孢粉学研究有一点基础，但很肤浅，要独自开展孢粉学研究困难比较多，信心不足。但在吴先生的多方指点和启发后，我经过再三考虑，并且从实际出发，决定选择孢粉形态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于是我遵照吴先生所确立的研究方向，从建立孢粉学实验室开始，一步一步地开展。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吴先生自始至终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热情的指导和多方面的关怀。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吴先生原来是在分类室大楼办公的，只有一间办公室。为了建孢粉学实验室，他主动把办公室腾出来作为建孢粉学实验室用。但是，就在我搬进去并准备打墙装修实验室时，分类室的同志和所里其他领导认为在该大楼内建实验室不适合，一来破坏性太大，二来实验室与办公室在同一办公大楼内，无疑会互相受到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实验室的化学药品会给整个办公大楼带来特殊的气味和腐蚀作用，如冰醋酸、二甲苯、硫酸等。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在分类大楼建立孢粉学实验室未能实现。后来吴先生又建议在植物生理楼内腾出一间改装为孢粉学实验室。就这样，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孢粉学实验室地点终于确定了。

二、实验室地点确定后，接着又根据他的建议，在所里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优先给孢粉学实验室拨款五万元，作为装修实验室、购买仪器设备以及开展孢粉学研究的启动经费，如买显微镜、离心机等设备和花粉分析用的化学药品等。实验室建成后，不仅从事孢粉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可



以开展工作，而且为所里的研究生，尤其是分类室的研究生提供研究条件，他们的孢粉学研究几乎全都在这里进行。要不是吴先生对建孢粉实验室如此关怀和重视，并给实验室优先拨款作为起动经费，就绝不可能那么快就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吴先生不仅重视现代孢粉学的研究，而且很重视古孢粉的研究。记得那是1982年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沃克（D. Walker）教授来到云南。与北京植物研究所、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和贵阳地化所的同志，其中包括徐仁院士、刘东生院士等一起，住在昆明连云宾馆，在那里开会商量如何在云南开展中-澳第四纪孢粉学的合作研究。期间，吴先生与沃克教授、徐仁院士以及刘东生院士联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希望把我所作为非正式单位也参加进去，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有关古孢粉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吴先生的这个想法和建议被他们采纳了，我们所作为非正式单位参加了“中-澳第四纪孢粉学合作研究”项目。会议结束后，所里指派李锡文和我参加该项目。我和李锡文与北京所、南古所和贵阳地化所的同志一道，在沃克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在云南南部等地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野外工作，学习到一些有关古孢粉采样技术等知识。

三、至于对人才的培养，以我自己为例。在中-澳第四纪孢粉学的合作研究会议期间，有一天，吴先生亲自到连云宾馆约见沃克教授，并且把我也带去了。见到沃克教授后，吴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他，并且提出，希望他接收我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和开展孢粉学研究。他当即表示同意。但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派遣要求，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去工作一年，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只接受我作为研究生去学习3年。这样一来，与中国科学院的派遣目的不同而没有达到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目的。尽管这样，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吴先生对我的出国深造问题是非常关心的。虽然这次出国未成，但198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被中国科学院再次派遣出国时，吴先生非常积极地与美国多所大学联系。就这样，我终于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孢粉学一年多。在我出国前，他不仅给我交代一些任务：如选择一些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类群作为研究对象，还希望我好好学习和工作，打好基础，学好本领，以便将来更好地为我所开展孢粉学研究。幸运的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当我在寻找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类群作为研究对象过程中，我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正好找到了好有代表性的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鹅掌楸属北美种植物北美鹅掌楸 *Liriodendron tulipifera*。该属的另一种（东亚种）为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它分布于中国长江以南至印度支那。当我回国把鹅掌楸属植物的孢粉学研究结果向吴先生汇报时，他很细心地比较了这两个种的孢粉学特征后，同样认为其花粉形态，尤其是电镜和透射电镜的超微结构特征对于区分这两个从外部形态上难以区分的种及阐明彼此间的演化关系很有意义和科学价值。他从工作的总结直到文章的撰写过程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共同发表《鹅掌楸属花粉超微结构及其系统性意义》一文（见《云南植物研究》1993:15（2）：163-166；和《吴征镒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560-563）。

从孢粉学实验室的建立到现在，在吴先生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在孢粉学的研究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发表有关孢粉学文章（包括研究生的文章）近70篇。作为我们总结性工作的代表作《种子植物花粉电镜图志》一书2004年曾荣获第十二届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多年前王红研究员在已有的基础上还把孢粉学和传粉生物学结合在一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诚然，这些成果的取得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吴征镒先生。如果没有他对孢粉学研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要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永志不忘。

